

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

蔡凤书 著
齐鲁书社



55

序

严文明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的关系极为密切。自汉唐以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的往来可谓史不绝书。然而时代越古远，文献的记载就越少。有的还夹杂一些神话和传说，教人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记载虽然真实可靠，但因过于简略而无法穷其究竟。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资料，不受文献记载的限制，在研究史前和古代历史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近世以来，许多学者通过考古学研究来重建或充实中日古代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更多一些。中国学者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正在迎头赶上。蔡凤书教授的《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

凤书从事考古研究与教学数十年，成绩斐然。近年来又致力于日本考古学的介绍和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为此他几次东渡，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查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他曾发表过一些介绍日本考古学和探索古代中日文化关系的文章，翻译出版了由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撰写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他是我国对中国考古学和日本考古学都很熟悉的少数学者之一，是最有条件担当这一重任

的。

本书论述的范围十分宽广，上自历史的开篇，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下迄元末明初。涉及的资料以考古学为主，兼及文献记载，间或也吸收人类学、地质地理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两千年友好的历史。其实两千年前还不存在日本这个国家。若是指现今两国国境范围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而言，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因为在地质时代的第四纪曾经有过几次冰河时期，那时日本列岛同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原本生活在大陆上的居民不用渡海就可以到达日本。在日本国土上陆续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证实了这一点。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日本列岛同大陆分离了。当时的人类又还没有能力越过大海，两地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处在中断的状态。这时日本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则迅速发展，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便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从而出现了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当时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已成为东亚文化发展的中心，它的许多成就都向周围传播，并且深深地影响到周围地区的发展。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发生极其深刻影响的首推稻作农业和金属冶炼的传入。它不但推动日本社会由采集经济迅速向生产经济转变，而且大大加速了文明化的进程，使日本社会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书详细地介绍了稻作农业、支石墓、铁器、铜器、货币以及其它许多文化因素传入日本的情况，特别注意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读了使人耳目一新。对于那些争论较多的问题，则尽可能说明事情的原委和各家的不同看法，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秦汉以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不断出现高潮，到隋唐

时代达到了顶峰。唐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十分繁荣。日本这时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确立了天皇制度，处处以大唐帝国为楷模。日本不断地派遣人员到唐朝去学习，日本的都城、皇宫、寺庙和文物典章制度都有意地模仿唐朝，再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改造。我们至今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许多唐式的建筑，在正仓院和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到不少唐代的文物。此后到宋元时代，中日两国的关系似不如唐代那样突出，但实际上双方的贸易比以前更加发达，其它方面的交流也颇不少，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

本书除以大量篇幅叙述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外，也没有忘记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过在史前和古代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到近世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尊重客观历史的表现。

近年来中日考古学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两国间经常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使得各自都已有数十名懂得对方考古学的中青年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出版了《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许多日本学者到中国来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某些重要课题的研究。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且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时至今日，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已经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考古学界也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对外国考古学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现在必须加倍努力，特别需要做些切实的工作。凤书曾多次呼吁加强对日本考古及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他已年近花甲，工作繁忙，又多疾病，居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

电脑的键盘上硬是一个个字地敲出了这本《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事情！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但会带给读者许多新鲜的知识，而且必定会促进中日考古交流事业的发展。

1995 年

前 言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二者相互之间交流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尤其是最近这 20 多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使得两国人民都清楚地认识到，世代代和平相处、长期不断交流互惠，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任何一方的统治势力如果企图逆转这股潮流，除了证明他们是徒劳的之外，只能说明他们对于历史的无知。这些逆潮流而动的人也必将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随着以世界反法西斯人民胜利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特别是最近的 20 多年以来，“冷战”的威胁渐次消除，国际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在 1945—1995 年的 50 年的时间之内，如果我们剔除一些局部的、规模比较小的战争之外来看世界的话，可以说整个世界基本上处在一个和平交往的时代。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对于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士来说，他们不仅仅只满足于现代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文化、经济现状的研究和了解，而且还要进一步地追根求源，探讨被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那些古代各个民族与部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就是

近年来在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热”、“海上丝绸之路热”、“丝绸之路热”……等历史研究热点的背景。当代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客观有利的条件，抓紧这一大好时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各种途径研究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不仅是时代赋予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良好的机遇。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的20多年期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总是处于一种不温不凉的状态。作为日本的统治阶层来说，他们一方面要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外部的压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迟迟不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作为日本的人民来说，随着日本经济的飞起，他们急切地要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开展贸易活动，也要求和中国的文化科技界人士进行交往和切磋。

这儿姑且撇开别的不论，就以与本书有关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它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早在1957年的时候，日本考古学会就曾经组织过以著名的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先生为团长、包括有20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在内的大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须知，那个时候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还没有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而这一代表团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来到中国，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这个代表团来到中国，受到了以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得到了中国学术界广大人士的热烈欢迎。当这一代表团回到了日本之后，团员们分头到处巡回作讲演，并多次著书立说，宣扬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和考古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日本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学术界，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轰动的效用。他们呼吁中日之间加

强交流，也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当年那个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樋口隆康教授（38岁）每每忆及此事，感慨万分。此事在七十年代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考古学大系》的第16卷上还特书一笔，并且附有当时的照片，令人难以忘却。

在1972年的时候中国与日本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事隔了不过六年，到了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定了友好条约，从而标志着一个旧的阶段之结束和新的历史篇章之开始。这对于我们研究和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自从那时以后，隔绝了多年的学术情报从此得以交换，在学术上的研究缺环有可能通过直接的相互访问得以填补，两国的学者们能够静心坐下来，一起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砥砺、取长补短，一个清新的学术春天已经到来。

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来看，中日人民中间的友好是主流，也是大势；而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支流，也是非主要的。认真地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分清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之中，不仅《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隋书》以及《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在列传中单独地介绍了所谓的“东夷”倭人的风土人情，赞颂了中、日（倭）之间的交往，而且一些文人骚客在笔记小说中也有所记载。自从唐朝以后，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有了《日本列传》，而不再附在《东夷列传》之中。清代的外交家黄遵宪长期居住在日本，在他回国之后写成了很有影响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志》两本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日本古代的典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书纪》中

也有不少关于古代中国和日本交流的历史记载。至于近代和现代中日学者们所写的中日关系史、中日交流史的著作就更多了^①。

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化，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从文献上找资料作为论据，并且由此入手的研究方法了。在研究古代中日交流历史的时候，有许多人开始着手利用考古发掘调查资料、出土文物、传世文物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手段，进行追根求源。笔者认为：文献史料终穷有日，若是一旦枯竭，研究者们便只有在如何解释这些史料上下功夫的份儿；而考古发掘调查所获得的古迹及文物资料，往往是层出不穷，使人难以预料，从而时刻在改变着人们的陈旧观念，有时甚至会推翻旧有的历史结论。

我们应当老实承认，在利用考古学的发掘调查资料来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日本的学者比起中国的学者来不仅起步早，而且一直非常积极和主动。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飞起，政府对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投入比较多，学者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中国的考古发掘资料有密切关系，同时与日本的科学技术发达、电脑普及以及出版事业繁荣也是分不开的。

目前中国的学者从考古学上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论文，多数发表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文史哲》以及《中国文物报》等少数刊物或者报纸上，而出版的专著则几乎没有。笔者在这方面虽然也作过一些研究工作，但是比较零散，就整体上来说难以使人满意。

反过来看看日本，早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在该国出版《日本の考古学》（1964年河出书房）的时候，在按时代的每一卷的末尾都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利用了他们能

够获得的中国考古学的资料，作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当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日本的考古学界翻译并出版了许多中国考古学丛书，往往是中国每出版一本重要的考古学著作（特别是那些综合性的著作），不出几年的时间便可以在日本的书肆里看到她的日文译本；日本的考古学者们每次组团到中国考察，当他们回国之后，必定要写出考察报告，中日学者们联合研究或共同探讨的问题大都出版专集，就连每个月出刊一期的《文化财月刊》，也必定在每一期中报导一些有关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新消息。至于在一些杂志或者是不定期的刊物上发表的从考古学角度上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论文那就多得不可胜数了。

对于考古资料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但又并非正确的看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这方面的例证并不是罕见的。举个例子来说，有的人把《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的那个秦代方士徐福（市）说成是中国到日本去的第一人，并且把徐福加以神化，说大陆上的稻作农耕是经过他的手才传播到日本去的，说他是日本的农业之神，医药、金属也是经徐福之手才传到了东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说徐福就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可是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早在中国大陆上秦代建立以前，在日本列岛上就有了农业耕作和各种金属，这又应当作如何解释呢？这只能说明，过去有些人根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而演绎出来的是神话故事，不是历史。笔者认为，我们对待文献历史的记载要重视，但是也要慎重，在研究古代历史的时候最好用考古资料来验证历史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东方之人曰“夷”，西方之人曰

“羌”，北方为“狄”，南方为“蛮”，只有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才是中国，即中心之国的意思。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倭人）也曾经被中国人视为夷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许多正史的记载上把倭人的事迹列入《东夷列传》之中。我们还知道，中国史书上所说的“夷”有很多个分支。《后汉书》上就讲到有所谓“九夷”。我们现在常常喜欢说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是“东夷人”，有的人把现在仍然居住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彝族也看成是夷人的一个支系。古代的夷人不断迁移、不断分化，或者与其他民族及部族融合，如果单单凭古代史书的记载，我们便很难以分清哪些夷人分布在哪个地区、哪些夷人是今天的哪个部族了。因此，我们必须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入手，作一些细致而又具体的分析，以解决夷人的来龙去脉，这样做也许有希望能够确定今天的日本人是哪一支的夷人了。

在注重吸收当代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决不可以忽视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发掘和探讨。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献，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包罗万象，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这些典籍不仅在数量上可称得世界首屈一指，而且其涵盖面非常之广：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域内记事、海外见闻……几乎无所不包。中国古代的文献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她所记载的内容延续的时间长、可以信赖的程度高，上起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下迄明清之际的笔记小说，前后延绵时间达 3000 多年。这其中有许多的历代的传说，已经被证实是可信的。就连过去曾经被疑古派视为荒诞不经的商代的帝王世系，也被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字所证实了。由此足以说明古代的文献对于我们研究中日

文化交流史是多么重要了。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古代的典籍并非是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赖的。倘若仅仅是依靠这些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不加以仔细检选和考察而着手编写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恐怕又失之偏颇，脱不出前人之窠臼了。

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与其他的学科没有关系，或者是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这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尤为突出。我们在注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参考古代文献记载的同时，还应当吸取人类学、地质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将它们用于本课题的研究。

就中国考古学所研究的时间范围而言，其时间上限起自人类的产生的时代自不待言，至于它的下限一般学者是界定在明朝的初年（即公元14世纪之末）。本书所要阐明的历史内容，大体上是自远古时代开始，一直到中国的元末明初这一期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这一段时间在日本的历史上则相当于远古时代到镰仓幕府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些“时间差”，不可以等同。本书也力图遵循这一原则。

这本书主要是利用了笔者所能够看到的现有中国和日本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并且参考了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料，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而对于那些目前尚难以做出结论的问题，也尽量做了资料上的梳理工作。

古代中日之间的交流表现在各个方面，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除了物质文化之外，在文字、佛教信仰、儒学及道教、文学艺术、文物典章制度上，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深，其历史的足迹处处可见，限于篇幅，本书不能够作面面俱到的论述。对于那些有考古资料

为佐证、关系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问题，尽量做出合理的诠释，这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文化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像经济领域中的贸易那样：输入与输出应当尽量保持平衡，以求互惠互利。文化的交流中存在着一种顺乎自然流向的趋势，就像我们平常在口头语中所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样。用这句话来形容文化传播的方式也许是并不十分恰当，但是我们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却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

正当夏、商、周三代帝国在东亚大陆崛起的时候，日本列岛的居民尚且处在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上，不知道文明为何物。即使是在夏、商、周之后，中国大陆的文明依然在东亚地区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日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难以理解的。在这漫长的数千年时间内，尽管在某些方面日本对中国也有过影响，中国也曾经向日本学习过，但是比起前一种情况来看，毕竟是比较少的。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末叶才发生了逆转：一方面是满清帝国政治腐败，经济匮乏，军事落后，从而不得不采取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实行高压与封锁的政策；在经济上，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政治上拒绝革故鼎新，抱残守阙，以至于落得了个日趋衰落的结局；在科学技术上，不肯吸收世界上新的发明创造和研究成果，视新生事物如同洪水猛兽。另一方面是日本由于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在政治上瞄准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外开放，由“锁国”变“开国”，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号召富国强兵。日本人将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而转向欧美。这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带来了戏剧性的效果：原先是日本人大量地派遣学问

僧和遣唐使到长安，现在是大批的清国留学生集中到了东京；原先是日本效仿中国建立了律令社会，现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觉者到日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甚至于中国人最初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间接从日本那儿学来的。这是后来的事，不是本书所探讨的范围。

不过，笔者之所以在此加笔阐明这一点，目的是想说明文化交流的独特性，不至于使人们产生错觉，以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对日本发生单向的影响，其间也有转逆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可以轻率地做出简单的结论。至于有少数人认为日本古代文化的所有一切皆为中国文化的翻版，那更是很不符合实际的。

【注释】

①在这方面的参考书比较多，例如：

（日本）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译本为胡锡年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日本）藤家礼之助《中日交流兩千年》（中译本为张俊彦、卞立强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李季《两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学生社，1938年；

（中国）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

（中国）汪向荣《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等等。

1996年代中日学者们还联合编著了《中日文化交流大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这本书笔者还没有读到，所以在本书中未能吸取。待日后再行补充。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交流的开端	1
第二章 公元前 4000 年到 2500 年间的中日 交往	23
第三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滥觞期——公元前 2500 年到 500 年	41
第四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黎明期——从稻米 传入日本说起	63
第五章 支石墓之谜与中日交流的路线	82
第六章 第一个高潮——战国秦汉时代中国 对日本的影响	100
第七章 第二个高潮——卑弥呼女王与魏晋 的交往	143
第八章 隋唐文化东渐的序幕——4 至 6 世 纪的中日之交	160
第九章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顶峰期——隋 唐时代	192
第十章 藕断丝连——五代以及宋、元时期 中日的民间交往	256

第一章 中国大陆和日本 列岛交流的开端

按照过去传统的说法，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一个说法的主要根据有二点：第一是东汉时代的学者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第二是在南朝人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中记载着建武二年（公元 57 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中日友好两千年”这句话，便不胫而走，被使用于各种场合了。假如说作为一个概括而又便于记忆的说法，广泛流传于人民大众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是，如若是认真地计较起来，在两千年以前，不仅没有日本这个国家，甚至连“日本”一词尚且不存在，又何尝谈到“中日之间”呢！

上面所说的这些，目的并不是否认中日

交往的长久。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材料证实，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远远早于两千年之前。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为中日交流的历史作了时代上的溯源^①。在那篇论文里，因为局限于杂志所规定的篇幅，未能展开并再作更进一步的阐述。所以我打算在本书中再作一些补充论证。

要说明这一个问题，首先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列岛在东亚地区所占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今日的日本列岛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以冲绳群岛作为代表的数百个小岛屿所组成。这些岛屿从东北向西南作斜方向排列，隔大海与亚洲大陆连成两个弧形：北面是经过北海道、库页岛而与原苏联的滨海州、西伯利亚相互对应；西南面由冲绳群岛和我国的台湾省作为“过桥”与广东省、福建省互相对应。这样的一个地理特点，再加上日本列岛的九州与朝鲜半岛的南端只隔着一个很窄的海峡，这便注定了古代日本文化来源的多渠道性。在日本的历史上，除了其固有的一些文化因素之外，她还有条件吸取来自东北亚、中国东北、山东半岛、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的多种文化因素，尤其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日本列岛的居民将中国山东沿海以及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因素融化到自己的文化之中，也是十分方便的。

上述的地理特点，是我们现代人看到的。可是我们知道在人类产生之后的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斗转星移，地球也是几经沧桑，发生过许多现代人难以想象到的变化。所以，东亚的大陆和日本列岛在不同的时期有也有不同的特点。

根据地质地理学者们多年来精心研究的结果证明，在地球历史上被称作“第四纪”的那个时代（具体地说，自 300 万年